

培育理性沟通的舆论环境，破解非理性对抗困境

——以湖南二三〇项目舆情事件为例

刘瑞桓 王桂敏 张瀛 戴文博 王晓峰 罗朝晖

摘要：近年来，“邻避现象”已成为我国建设项目落地的难题，“邻避事件”的发生暴露出社会治理和公众沟通方面存在很多缺失。本文以湖南二三〇项目舆情事件为例，结合近年来发生的涉核舆情事件，探讨如何培育理性的舆论环境，破解非理性对抗困境，以构建我国健康良性的核安全舆论生态。

关键词：理性沟通 非理性对抗 邻避 舆论生态

近年来，“邻避现象”已成为我国建设项目落地的难题，“邻避事件”的发生暴露出社会治理和公众沟通方面存在很多缺失。诱发项目“邻避事件”原因较为复杂，既可能源于对安全的担忧，也可能出自对利益的诉求或对伦理的考量，而发生群体性对抗的“邻避事件”更多的则是群众的非理性盲从。近期发生的“湖南二三〇项目舆情事件”从线下聚集示威发展到通过律师诉讼所表现出来的理性沟通，成为我国核领域公众沟通中通过政府与公民的理性博弈解决问题的良好开端。

一、湖南二三〇项目舆情事件概况

2018年12月25日，长沙市岳麓区学士街道在枫华府及周边小区的公示栏张贴关于“核工业二三〇研究所”项目建设工程设计方案的批前公示。当晚，“恐核”言论由单个业主微信群迅速扩散至周边小区，多个小区的业主加入“含浦环境保护群”抵制二三〇项目落户。次日，网民“爱家园”在红网“百姓呼声”栏目发表题为“关于核工业二三〇研究所落户岳麓区含浦居民区的强烈抗议”的帖子，与该项目直线距离最近的周边小区民众对此项目的建设表达强烈的抗议，并前往主管部门岳麓区科技产业园管委会表达诉求。

2018年12月28日，针对含浦区人民的质疑，岳麓科技产业园管委会发表《关于核工业二三〇研究所、湘核计量检测研发基地项目入园的情况说明》，对两个入驻项目的相关情况作了比较详尽的说明，对项目性质、主要业务及居民关切的若干问题作出回应。

2019年1月1日，微信公众号“谭逸歌”发表题为《一名含浦博士生致湘核拟购放射源的新年信》的文章称，“你们要是真来，我得先跟你们‘约法三章’，也算作是给你们善意提醒。”次日，微信公众号“湘核计量检测”发表题为《致含浦谭逸歌博士新年信的回信》的文章作出回应。

2019年1月7日，核工业二三〇、湘核计量项目召开专家答疑座谈会，邀请7名全国行业内权威专家及100余名居民代表参加。1月8日，湖南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潘碧灵率领厅辐射处、辐射站负责人赴岳麓区科技产业园调研核技术利用项目建设工作。

此后，微信公众号“长沙郭雄伟刑事辩护团队”陆续发表了《一个含浦居民致潘碧灵副厅长的公开信》《核工业二三〇，别再忽悠政府和百姓》《生态环境部，你不能这样护短》等16篇文章，理性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和诉求，得到抗议居民的认同。

二、涉核项目发生非理性对抗的原因分析

随着信息技术的普及和信息传播渠道的多样化，公众获取信息的速度更快、途径更广。部分谣传、虚假信息和误导信息在传播过程中所起到的负面作用强化了“邻避效应”，究其原因存在多种因素。

（一）核能科普知识的严重匮乏是根本原因

尽管中国核电已经发展了 30 余年，各核电企业也举办了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但是，从 2011 年杞县抢盐事件、2012 年反对彭泽核电事件、2013 年鹤山燃料园事件以及连云港核循环事件公众的反应看，公众对核领域的相关知识知之甚少，公众仍普遍存在谈核色变的心理，对“核”仍存疑虑，甚至担心。除了相关企业和专业人士，真正理解和支持涉核项目的公众占少数，更多的是本能地选择反对。核工业二三〇项目舆情发酵后，在媒体的调查采访中，发现大多数居民对核安全方面的知识了解很少。当地政府、园区、涉事企业负责人和部分居民都认为，湖南虽是核技术利用大省，但公众核科学知识普及情况不容乐观，仍然是谈“核”色变。

（二）“邻避效应”的盲从心理是主要原因

近年来，我国邻避现象以及由邻避现象引发的邻避冲突频发，居民出现抵制情绪，产生“不要建在我家后院”的心理，甚至采取高度情绪化的、激烈的集体反对或者抗争行为。在二三〇项目公示阶段，个别居民在对项目并没有进行全面了解的情况下，便凭个人推测和臆断，在朋友圈、微信群发布项目影响生活、影响健康的不实消息，项目周边部分居民出现情绪急躁、盲目随从的“邻避”心理，导致流言进一步发酵和扩散，从而引发了对项目的热议甚至抗拒。如果政府和企业项目建设过程中不能及时疏导公众情绪，妥善处理公众正当诉求和有效治理邻避问题，就很容易导致邻避现象升级为邻避冲突。

（三）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不足是重要原因

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严重影响了涉核项目公众沟通效果，也形成了公众对于环境影响评价流于形式的印象。例如鹤山燃料园事件在新闻发布效果不佳的情况下，当地政府不得不以公告红头文件的形式宣布项目取消，抗议者才罢休，折射出公众对政府的“不放心”。此外，大多数涉环保项目选址都没有经过充分的讨论沟通，甚至封闭式决策，公民参与渠道不畅通、程序不完善，导致公众不能有序参与获取信息、表达意见，或者能够表达意见，也难以得到真正重视。如此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项目消息公布后就遭到强烈反对，进而对政府产生“信任危机”。理性的公共决策，一是能化解公民焦虑，二是能增加公民公共理性。

（四）新媒体放大宣传是具体原因

随着互联网的广泛应用和新兴媒体的快速崛起，社会进入了大众麦克风时代，媒体生态和大众传播环境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一方面便捷了信息主客体之间的沟通，另一方面强化了信息主客体影响舆论走向的能力和风险放大能力，邻避冲突更加易发和复杂。在信息传播和产生社会影响过程中，信息被解读、判断并附加价值。涉核事件中，代表官方舆论场的传统媒体，对事件的报道相对审慎，对风险信息的建构较为客观。而代表民间舆论场的贴吧、微信、微博等新媒体，在对事件议题的建构过程中，常呈现出对涉事风险的恐慌以及对官方信息的不信任。核“污名”的传播，使得公众“谈核色变”，并导致涉核项目受到民意的强大阻力。

三、培育核电领域理性舆论环境的必要性

良好的理性沟通环境，不仅仅需要政府相关部门的努力，更离不开培育和提升现代网民理性和文明的人文素养。培养理性公民，使其能自主、理性地行使权利承担义务，从而能促进社会各方面因素全面、稳定、协调、可持续发展。面对公民社会的发展，对于理性公民的需求愈来愈紧迫。

（一）社会培养全体公民理性思索的需要

当前，我们探索破解核电邻避困境之道，是要摒弃仅凭一家之辞就决定对事物喜好的思维定势，崇尚并鼓励理性的思索与科学的指导。理性精神是中国文化的一种基本精神，强调遵循一种基本的自然法则和人文秩序，强调不轻信、不盲从，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和判断，是维护社会公共秩序的文化精髓。在纷繁复杂的新媒体时代，全体公民尤其需要强化自己理性精神的培养，学会理性分析和多方求证辨伪。在二三〇项目舆情事件中，以郭雄伟律师团队

为代表的理性公民始终保持客观的态度，从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进行判断，将居民从感性认识引向到理性认识，为避免继续出现大规模群体事件起到了积极作用，这对破解我国核电邻避困境的协商治理与解决具有极强的示范性意义。

（二）政府跳出“塔西佗陷阱”的需要

“塔西佗陷阱”强调的是执政者与人民群众应保持密切的沟通与联系。近些年不断爆发的垃圾焚烧厂、PX 项目的邻避事件逐渐进入民众视野，这些重大项目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浪费了不菲的社会经济成本和难得的发展机遇，也为核电行业顺利发展敲响了警钟，揭示出核电在社会管理和公众沟通工作还有很多缺失。二三〇项目含浦公示事件发生后，大部分居民均第一时间认为政府监管不力、审批不严，充分说明政府在信息公开、办事效率、透明度方面有待提高。但是，舆情爆发后，当地政府相关部门迅速回应公众关切，与郭雄伟律师刑事辩护团队为代表的群体开展良性互动，阻止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可以说是此次舆情事件的亮点。

（三）强化主流媒体责任担当的需要

自媒体在我们的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凭借海量信息和快速、互动等特性，能够快速地将各种各样的声音传播给不同的受众，不同的言论之间相互切磋碰撞。但其中不乏“专家”反核言论，核电站周边一旦发生较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一些对该领域毫不了解的民众由于各自片面认知，加上缺乏正确的舆论导向，很多网络谣言利用大众的恐慌心理进行泛滥式传播，公众不能够明辨是非，以讹传讹，造成了社会的混乱，也无疑会对核电站乃至核电行业造成较大负面影响。而主流媒体更具权威性、专业性和公信力，建立公共和互联网互动平台也更容易为受众接受。因此，作为网络关键信息源的主流媒体，应进一步强化自身的作用和功能，全面引导网络信息的舆论导向，保障信息的有序传播和健康发展。

（四）“互联网 +”时代加强社会舆论引导的需要

网络和数字技术裂变式发展已将我们带入“互联网 +”时代，这个“+”号代表包含核电在内的各个传统行业。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巨大差别，为传统的核电公众参与带来更高要求和更大挑战，网络的裂变式传播速度加大并拓宽了人们对公共事件的关注度。意见领袖常常是热点事件的见证者、思考者，往往处于信息源的上端，成为信息的权威发布者，信息裂变式的传播方式更使意见领袖舆论监督的作用发挥到极致。如果能把意见领袖培养成核电领域的理性公民，面对一些涉及到公共利益的重大核电项目时，他们发出的质疑或肯定的声音以及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将起到积极的舆论引导作用。

四、培育核电理性沟通的舆论环境的建议

我国核电公众沟通的难点在于很难针对核电的质疑进行理性辩论，要破除“邻避效应”，一定要公民参与，充分发挥公民的话语权，这是民主社会发展必然的趋势。只有政府、企业、专家、公民联合开展深度沟通，才能使“邻避”变成“邻利”。

（一）培养扶持意见领袖，推动政府治理转型

政府部门应修正传统的风险治理理念，正视邻避项目社会风险的存在，由僵化的、静止的刚性稳定观转化为开放的、弹性的韧性稳定观。培养扶持意见领袖，引导公民理性沟通成为有效引导网络舆论的方法之一。首先要团结网络意见领袖，加强交流沟通，吸纳其合理建议，增加其参与舆论的积极性。从而赢得他们的理解和支持，也能促使决策者及时调整工作思路，推动政府舆情管理的转型。其次，培养自己的意见领袖，比如让有影响力的官员、知名专家学者、媒体人士、有社会责任感的明星，通过他们发布积极正面和权威言论，引导网络舆论健康发展，最终促成整个网络舆论环境的健康和谐。

（二）探索协商民主制度，维持话语权平衡

赢得民意和社会许可已是目前我国核电和核技术设施选址过程中的主要问题。核电邻避困境的化解既需要在微观层面针对风险感知差异而展开针对性的理性沟通和共识协商，同时

也更需要宏观层面的制度缓解。在风险协商治理方面探索制度创新,将我国在环评和社会稳定评价等风险沟通相关的制度细化为具体实践,通过制度化措施来缓解社会不信任。建立健全收集、分类、吸纳、交办、督查、反馈的协商民主制度链条,形成网上听民意、汇民智、聚民心的长效机制。通过制度建设,为公民理性参与到核电重大决策开辟新渠道,依法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和决策权。

（三）塑造主流民意，优化媒体“把关人”角色

近年来媒体报道新闻时“标题党”和片面报道现象日益严重,核电相关新闻尤甚。媒体首先应有意识地对邻避事件报道中的信息进行筛选与安排,融入对核能利用技术的反思、对理性参与的引导、对环境责任的提倡等;其次要主动积极设置公众关注的议题,并甄别出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参与意识的理性公民引导舆论的良性发展,引导正确的舆论方向。从而避免别有用心在网络大V利用微博、博客、论坛等虚拟社区平台,通过夸大、放大以及虚构等手段,在重大突发性事件中进行煽风点火,混淆视听,故意制造舆论的混乱,误导公众的价值观和信息判断,使舆情失控,给核电发展的舆论环境带来威胁。

（四）重视求同存异，推进“理性公民”分类管理

根据职业特点,可将理性沟通的公民其分为明星型、精英型、政务型、专业型、公益型、宗教型等类型。由于网络意见领袖的身份存在隐匿性,传播的信息和观点良莠不齐,管理者需要学会“求同存异”,对他们的引导和管理上要针对其来源、特征以及不同的发挥作用等特点,划分重点、区别对待、分类管理。例如,对于核电技术有疑问并想开展讨论的“理性公民”,可进行一般的引导;对于对核能发展表现活跃并持反对意见的网络意见领袖则要进行重点关注;对于论坛的版主、网站的负责人应加强培训和管理,使他们成为规范网络行为、引导网络舆论的重要力量;而对于别有用心散布谣言、破坏社会安定团结的人,要保持高度警惕,重点监控,并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时予以揭露和处置。

参考文献:

- [1]李文姣.邻避型群体性事件中的心理台风眼效应研究[J].学习论坛 2016.
- [2]谭爽.邻避项目社会稳定风险的生成与防范——以“彭泽核电站争议”事件为例[J].《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4:46-51.
- [3]刘 珠,赵珥希.核电走出去战略下民众恐核心理及其对策分析[J].信息材料记录,2017,
- [4]杜祥琬.核电发展要破除邻避效应[J].《中国科技奖励》,2017年,09期
- [5]陈润羊,花明.我国核电应对邻避效应的路径选择[J].《中国科技奖励》,2017年,09期
- [6]顾理平.信息消费时代公民理性精神的培养[J].《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7
- [7]邓理峰,王大鹏.重思邻避困境的风险沟通与治理问题:基于核电的讨论[J].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